

# 哲学主题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走向——兼论“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解

鲁品越

## 一、从实体理性到程序理性：哲学主题的历史变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主题变迁总是折射出时代精神的走向。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心智首次从对自然现象的神话解释中解放出来，寻求对自然的理性解释，哲学也因此从原始宗教的胚胎中诞生出来。然而自然哲学只是拉开了哲学的帷幕，其主题尚未确定。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哲学进入了更深层次：不仅探求对自然事物的理性解释，而且探索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整个宇宙的理性解释。于是真正的理性哲学诞生了：现象背后的“本体”、“本原”和“本质”成为哲学的主题，此即理性化的“本体论”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其范本。理性主义本体论哲学的目标，是寻求世界的“实体理性”（事物实体遵循的理性法则），建构现象背后的理性化逻辑化的本体论世界图景。然而世界为什么是符合理性的逻辑体系？古典本体论哲学对此只是采取信仰主义的独断论，这就是“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前进了一步，企图用人的理性来证明既定的神学结论，努力使《圣经》中的世界理性化。经院哲学的消极意义在于维护旧的宗教教条，而其积极意义在于：借僵硬的宗教教义外壳孕育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方法，从而在其内部孕育着哲学主题的划时代变革的种子。

经院哲学所采用的理性方法和它所论证的神学信条无法相容，最后终于发生了人的理性方法与神学信条之间的冲突，哲学的主题逐渐从“世界的理性”转向“人的理性”，笛卡尔是发动这一哲学主题历史变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笛卡尔首先寻求的不是世界的理性模型，而是那种能够得到关于世界的确实可信的知识的“理性方法”或“理性程序”——这就是被后人称作“笛卡尔式怀疑”的方法。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使“理性”一词获得了新含义：不仅指世界本身所遵循的理性法则，更指人类认识世界的理性方法和程序。从此开始，哲学的主题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实体理性”转向“程序理性”，由探讨事物的理性逐渐转向人的理性。其后出现的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等等是对这种理性方法的补充。哲学主题从“实体理性”转向“程序理性”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弗兰西斯·培根，他在《新工具》中提出了认识客观世界的另一理性方法或理性程序：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归纳逻辑方法。此后的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直到20世纪初叶的分析哲学家，都以认识世界的理性方法与程序作为他们的哲学主题。20世纪初对科学语言的分析，仍是这一主题的表现形式。

柏拉图的“实体理性”和笛卡尔的“程序理性”，到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概念上的统一：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既是世界的理性法则和逻辑进程（实体理性），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逻辑进程（程序理性）；二者统一于他的逻辑学：逻辑学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所以，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古典理性主义的完成。而20世纪初叶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出现，则意味着基于经验的理性认识论走到了尽头。

于是，现代哲学主题将发生新的历史性变迁，这是时代精神发展的内在诉求。

首先，这是认识论哲学发展的内在诉求。笛卡尔和培根发现了认识世界的理性方法与程序之后，贝克莱、休谟等人对人类认知理性的可靠性发出诘难，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到底是否存在、可否认识的问题成为无法用程序理性本身来回答的问题。因此，哲学的发展要求从对“程序理性”的探索中解放出来，拓展哲学研究的视野，寻求哲学主题的转换。

其次，这也是关于“人”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自文艺复兴以降，人的价值与尊严获得了肯定，然而其在哲学中却只集中于对人的理性的肯定。“理性人”是近代哲学的理论预设，笛卡尔式的逻辑理性与培根的经验理性是“理性人”的两个方面。康德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理性人”的心理结构：由“先验时空形式”、“先验逻辑范畴”和“先验理念”构成的“纯粹理性”，并且指出了这种“理性人”的局限性：没有能力认识自在之物。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人不是仅具有纯粹理性的“理性人”，而是还具有对自在之物的实践信仰——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实践理性”。在此二者之间，人类还具有判断事物的感性形式是否合乎人的内在目的的先验“判断力”——审美能力。康德把哲学主题拓展为真、善、美的研究，这是哲学主题转向的先兆。然而他的视野仍局限在理性精神的范围内，现实社会生活仍被排斥在哲学之外，并没有实现哲学主题的真正变迁。

而推进哲学主题变迁的最根本力量，则是社会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上述“理性人”的局限性，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表现于社会现实中。在资本力量的统治之下，当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人”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格范型时，官僚管理体制、理性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技术体系的结合却使人的发展也片面化了，并且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无法持续。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把人从理性的“单维人”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二、生存论哲学转向及其缺陷

于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领悟到了西方理性哲学的缺陷和新的时代精神，尝试开拓新的哲学主题。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反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鼓吹非理性意志至上。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把意志主义哲学中的人的意志扩张为宇宙生命，建立非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哲学。这类哲学开拓了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人类非理性精神，是现代哲学主题转向的表现，然而具有极端主义倾向——从理性主义的片面性走向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片面性，所以它们只是哲学主题转向的畸形形

态；胡塞尔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对事物“中止判断”，将其“悬搁”在“括号”中，得到作为“现象学剩余”的“纯粹意识”，然后由作为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构造对象。至此，这种“纯粹意识”还是认识论概念，他所描述的意向性过程还是认识论过程，并没有实现哲学主题的真正转变。然而随着《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在1936年发表，胡塞尔开始从“认识论”转向“生存论”，现象学方法是这种转向的桥梁。而在此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实现了哲学主题的生存论转向。他把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到的“纯粹意识”，引入到他认为具有更深内涵的、被以往西方思想中的“存在者”概念所遮蔽的“存在”本身，并进而将存在定格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关于“此在”的学说——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哲学。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雅斯贝尔斯等人，也把哲学探索的聚光灯集中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主题上。

然而，生存论转向强调“此在”“被抛入在世之中”，意味着有一个先于“在世存在”的“本己存在”，并且将回到“本己存在”作为人生自由的目标。这一根本错误，导致其具有下述一系列缺陷：第一，生存哲学往往只强调外部自然社会环境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限制，追求回到人的“本己状态”的“自由”，生存过程只是原本的生命意义的“澄明”，所以带有程度不等的消极性。第二，当代社会遭遇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社会群体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然而现代生存哲学仍然只聚焦于个人生存状态，追求“本己存在”，无法给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建设性思路。海德格尔本人曾经坦言：他的“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将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第177页）第三，生存哲学以原子状态的人类个体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人的社会结构性，是抽象空洞而缺乏现实意义的。

### 三、马克思确立的当代哲学主题的走向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突破，把哲学主题从认识论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实现了哲学主题的伟大历史变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哲学主题变迁的宣言。其中，马克思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而提出的“实践”概念，远远超出传统本体论与认识论，开拓了前无古人的全新领域，确立了走向“人类社会实践生活”的哲学新主题。在这里，实践并非仅仅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本体”，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类创造历史、实现人的价值的活动。因此，关于实践的哲学，已经不是传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哲学，而是关于人的历史活动的哲学，马克思由此得到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便呈现出与既往哲学完全不同的崭新面貌：它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把哲学的聚光灯集中于人类社会实践及其历史发展。马克思随后沿此思路，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揭示了这种实践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状态，展示和分析了这种生产方式下人类的实践生活面临的基本矛盾，探索人类通向自由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局限在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视域内解读马克思，将他的伟大突破仅仅理解为方法论上（而不是哲学主题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建立了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而未充分领悟到马克思对哲学主题的历史性变革。这种解读方式相当严重地限制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屏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对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透视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注。正是这种解读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分解为三大部分：作为宇宙本体论（物质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能动反映论”，以及作为二者在社会领域中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苏联20世纪30年代教科书哲学体系则用机械唯物主义范式解读马克思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贡献，形成了一整套机械决定论观点。60至70年代的南斯拉夫“实践哲学”，以及我国80年代的“主体性哲学”的热潮，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然而这种解读方式仍然局限在本体论与认识论范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实践”概念，仍然仅被理解为一个认识论范畴，或者理解为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物质本体论范畴，这也导致了对马克思的误读。例如，在唯物论领域，热中于讨论实践与物质“谁先谁后”的关系问题、自然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等等；在认识论领域，热中讨论人的主体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有人甚至由于强调主体能动性而否认反映论；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其讨论主题是社会的物质性问题，简单地把辩证法套用在社会物质上，而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分析人类实践生活的基本矛盾，寻求人的解放之路。这些讨论囿于学院式的理性思辨之中，而未能更广阔的实践视野中寻求新思路，因而未能在活生生的当代实践中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活力。其实，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源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又超越这些领域，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全方位的哲学反映。由此确立的当代哲学走向，既具有超越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面向人类现实生活本身的现代哲学的共同走向，同时也具有其他流派无可比拟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克服了西方“生存论转向”、“意志主义转向”等的局限性。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使哲学主题转向个人生存或个人意志，转向人的生存意义的“澄明”，那么马克思使哲学主题转向人类社会实践生活及其内在矛盾，转向人在实践中通过客体对生命意义的创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不是“求生”，不是“权力意志”，也不是对“本己自由”的追求和“澄明”，而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中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人类通过改造自然与创造人类历史的实践来创造着自身生命的价值。由此产生的以人类社会实践为主题的哲学，马克思称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也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或许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刻画以“实践”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以现实的人为本”（简称“以人为本”）是它的灵魂；剖析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各个层次的实际矛盾是它的中心话语；尊重实践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它的基本方法论准则；而建立一个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273页）的社会形态则是它的最高价值目的。

### 四、实践生活基本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主题

马克思把哲学的出发点从“世界理性”和“理性人”转向“现实的人”，既表明了“对哲学史上的论争的深切洞见，也表明了对现代人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关切。这种“有生命的个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同上，第18页），不是“被抛到世界之中”的“此在”。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现实地生成为人，社会实践是人的唯一生存方式，而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尤其深刻的是：以实践为生存方式的人将不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之中。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从宏观上说构成人类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而从微观上说构成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正是辩证地分析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及其当代表现和历史趋势，以及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由此实现历史哲学与人生哲学的统一。它展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自然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人是自然界辩证发展的产物——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但非主题。唯物辩证法的真正主题，是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上述实践生活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与历史趋势。

从人的受动的、必然的方面来说，人类在通过社会化的生产力将其潜藏的本质力量通过现代生产力系统展示出来的同时，社会化的生产力系统反过来支配人类自身，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399、463页）不仅如此，被现代大工业破坏的自然环境也严重压抑了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早就提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于是，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力领域，人类实践面临着深刻的矛盾。而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源，则是社会关系实践中的矛盾。

第二，社会关系实践。在改造自然实践中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建立其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毕生的主要精力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上，其伟大理论成果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实践研究的范本。而贯穿其中的哲学主题，正是人类在社会关系实践中自由与必然、能动与受动的深刻矛盾，以及人类如何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能动性与自由创造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是人类自由发展的重大历史进程。与此同时，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社会关系实践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支配和奴役，这是人类受到现代生产力体系支配和奴役的社会关系根源。资本的力量使工人不仅在经济上陷入被剥削的地位，而且在劳动过程中也受到压制与摧残。不仅如此，执行着资本职能的资本家本身也被资本的力量支配，成为“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因此，生产力系统中机器对人的支配与奴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支配与奴役的物质表现。至于现代生产力系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同样根源于资本力量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

由此形成了当代社会关系实践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极大地激发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扩张和提升，又使由此创造出来的社会经济力量支配与奴役人类自身，奴役自然界并且招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严重限制了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这一深刻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发生。

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这一矛盾发展趋势的设想，其大意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提供的发达生产力，创造一种新型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系统不再成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机器，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并且通过“工作日的缩短”来建立“自由王国”，实现人们的全面发展。

第三，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6—127页）资本的扩张本性必然导致资本全球化，人类社会实践的矛盾于是从一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展开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矛盾。从人的自由、能动的方面说，世界各个民族创造的多样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在过去历史环境下的表现，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创造性得到了空前激发，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然而与此同时，由资本力量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也塑造了当今世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受到国际资本力量的奴役，而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强国也受到资本力量的支配，必须不断输出资本才能解决本国的重重矛盾。由此产生了旨在维护国际不平等结构的政治霸权，甚至导致一场场战争，造成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与文明冲突，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两个方面构成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分析这一矛盾并寻求其出路，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们享有越来越充分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强大的社会关系（包括市场关系与权力关系）力量也产生着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行业分化等负面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正是这些矛盾不断出现和解决、从而使人们在曲折中不断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这样的哲学将开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全球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分析当代全球化实践中人类实践遭遇的基本矛盾，以此为主线深入理解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变。以人为本、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是分析所有这些问题的主线。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我们分析上述各个层面人类实践生活基本矛盾的指南。

巴雷特，威廉，1999年：《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

罗素，1982年：《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1972年、1974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外国哲学资料》，1980年，商务印书馆。

韦伯，马克斯，1987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登贵（《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